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

“通情”以“达理”：新时代 中国特色亲情外交理论与实践

詹德斌 陈俊杰

[摘要]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表现出“情理相交、真诚温暖”的鲜明风格,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尚未对亲情外交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鉴于此,本文借鉴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以及“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径来构建亲情外交理论。首先,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理论积极汲取传统历史文化资源,其包含着“天下国家”现代化转型、党的领导以及民心政治的三重理论逻辑;其次,基于亲情外交的理论内涵,可以演绎出“天下一家亲”的世界观、“天下无外”的方法论和“化成天下”的价值观三个维度。最后,本文抽象和提炼出亲情外交的理论范式,并结合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进行初步验证。实践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情理并举、情理融通,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外交话语权,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关键词] 亲情外交;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国际关系理论;历史政治学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24.05.001

[文章编号] 1003-7411(2024)05-0003-(17)

[收稿日期] 2024-04-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245)

[作者简介] 詹德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陈俊杰,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1620)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表现出“情理相交、真诚温暖”的鲜明风格。2023年11月14日至17日,习近平主席在赴美国旧金山出席中美元首会晤期间应邀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宴会并发表重要演讲,他60多次提到“人民”这个词,寄予对中美友好关系的美好愿景。^[1]同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时表示,“感到十分亲切,就像到亲戚和邻居家串门

NORTHEAST ASIA FORUM

一样”。^[2]这些都清晰地表明中国外交饱含了人情味的心灵沟通,正如王毅外长所强调:“重情尚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外交的温暖底色。”^[1]

实际上,中国外交一直坚持以情感人、以心暖人、以理服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正有意识地、立体地、系统地将“亲情”融入外交话语、外交政策乃至对外关系中。这与2023年12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号召“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是一脉相承的。^[3]毫无疑问,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在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和建立与其他国家友好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从学理上系统提炼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理论,并对中国亲情外交实践进行学理分析,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既有相关研究文献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一是国际关系领域对情感的学理研究。默瑟(Jonathan Mercer)提出了“情感性信念”(emotional beliefs),并论证了领导人经常发表带有情感的信念,对国家间合作与冲突产生的不同影响。^[4]萨斯里(Brent Sasley)利用群体间情感理论探讨了如何将情感因素进行理论化的问题,他认为国家或集体成员的认知与情感行为共同塑造了国家的行动模式。^[5]郝拓德(Todd Hall)提出了“情感外交”(emotional diplomacy)概念,指出官方情绪不只是个人情绪的集合,而是被战略性地运用于实现政治目标。^[6]

二是中国外交中人际关系与亲情特质的研究。张清敏认为,习近平的外交风格对新时代中国外交“情理相交、真诚温暖”的风格起着相当显著的影响作用。^[7]尹继武认为中国外交中诚意信号的情感表达是非常丰富的,“诚意信号”概念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从理论层面揭示中国国家属性是情感和理性国家的结合,为探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情感因素提供了经验证据。^[8]此外,刘博文将情感投入定义为国家对其他国家、机构或个体投射的积极情感的外交行为,对中国外交对周边中小国家的情感投入进行了研究。^[9]

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与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径。如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秦亚青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等理论的共性几乎都是汲取传统文化滋养,体现中华文明的背景知识与实践智慧。在挖掘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论是“道义”“关系”还是“和合”等传统概念,一定程度上都嵌入了情感维度。^①此外,研究亲情外交从根本上也离不开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天下观”和政治伦理。历史政治学作为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实践的“中国性方法”,可以为中国外交理论研究提供启示。^[10]

综上所述,中国学界至今尚未充分地理论上对中国特色亲情外交进行系统研究。基于不同的知识背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未能富有说服力地解释和分析中国外交的亲情特质。有鉴于此,本文拟借鉴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与“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径,循着“历史—理论—实践”的逻辑,尝试构建亲情外交理论并对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作初步的学理分析。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的历史脉络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②不同的文明都蕴含着丰富的国际关系思想,构建非西方的国际

① 关系作为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情感。

② 出自《孟子·滕文公上》。

关系理论需要回归本土经验,选择适当的、可以被广泛接受的叙述逻辑。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理论正是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汲取滋养,更具有中国的本土性和原创性。

(一) 中国传统情感思想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与国家性格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的对外关系与行为。因此,我们显然有必要重新回到当初奠定中国人文化心理的传统思想上去。

第一,中国传统思想具有鲜明的“重情”特质。例如儒家推崇“道德情感”,墨家主张“兼爱(无别)”,道家追求“自然之情”。儒家将人类的情感放在首要位置,追求人的自然情感的满足与施展。儒家思想体系是一种在“天”“人”框架内展开的伦理学说,“天”一直是人性本原、人伦之道以及价值源头的依据。^[11]古代先哲认为“天”“人”本就是合一的,因此天道总是关乎人,它在流行中向下贯注,赋予人以道德性,所谓“天命之谓性”,^[12]人性背后对情感的尊重隐藏在“天”之中,也就是将情感作为人的生命本源和道德基础。^[11]

第二,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思维方式中,人同此情,亦源于天同此理,人的情感是与天理、天道紧密联系在一起。《郭店楚墓竹简》写道:“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庞朴先生认为,这段文字的“道”并不在天道而在人道,“道始于情”可以说就是“人道始于情”。^[13]李泽厚认为儒家伦理奠定了中国人情理交融、以情为本的文化心理。^[14]传统特质在人的心理层面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和巩固,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某种集体无意识表现的“深层结构”,至今仍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中国人的精神特质、社会规范以及国家制度。

第三,中国传统情感思想并非主张人性唯情论,而是主张情理兼具、情理融通。中国文化强调情理交融,理在情中,中国人总是讲通情达理,有情才有理,通过“情”达到对“理”的把握。一言以蔽之,“情感”被视为人性本质以及人生基础,强调人的情感教育,以之作为建设社会的根本,这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传统。^[15]这不仅是一种传统社会观念,由“情本体”而形成的理性化情感,还进一步外化为以礼乐文明为基础的政治规范。^[16]这一规范延伸到对外关系上便形成了传统天下观。

(二) “天下一国一家”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主席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7]历史政治学认为,中华文明具有一贯的历史连续性,基于中国历史经验的“深层结构”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对外关系与行为。^[18]先秦思想家坚持的从小到大、由内而外的“身一家一国一天下”的层次分析法,是具有严谨逻辑性的理论构建方法。^[19]

第一,由“家”到“国”。孟子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①儒家以“人性”为起点,从自然人情出发,将其推广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层面,乃至最后延伸到宇宙万物。按这种由近及远、由内而外的逻辑,家庭中的亲情转化与伦理关系是儒家设计家国天下的社会政治秩序的起点。费孝通先生曾比喻道:“由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20]其中“人之常情”的“情”正是维

① 出自《孟子·离娄上》。

系这种“差序格局”的关键要素。至此，“亲情”之“情”在不断类推下流转和外化，与不同社会层面紧密结合，从而产生了“亲亲”与“尊尊”原则。进而这一特征表现在对国家、天下的认识都遵循了类比家庭秩序的路径。家庭层面的亲情伦理规范也就相应地被类比运用到国家、天下的层次上。

第二，由“国”延伸至“天下”。《尚书》曰“始于家邦，终于四海”。^①“家”与“天下”在政治秩序层面实现了同构，即化“家一国一天下”的伦理秩序为“天下一国一家”的政治秩序。^②据此，先秦儒家也对社会政治的终极理想指出了方向，即以“亲亲”原则下的家庭共同体为模型，想象和塑造一个不再有无数小家之隔阂而囊括天下的共同体。^[21]故子夏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③“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④也就是说，家国同构延伸发展出的传统天下观，其目标是从家到国，从根本上是从天下到国再到家，其最终理想是追求“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家”的相统一。

第三，中国古代哲学更多地基于关系性思维来探究世界万物的本质规律。基于前文，传统天下观是以“天下一国一家”为基本模式，依据“亲亲”“尊尊”原则并通过“推己及人”的亲情进路，推广构建出合情合理的政治伦理秩序。这一设计构想表现出“仁、义、礼”等伦理实践和“关系”思维来开展对外交往。因此，以关系性思维提取“天下一国一家”中的“情理结构”，进而提炼出“(人)情→伦→礼→(天)理”的类推、贯通的逻辑链条。“伦”与“礼”既是这种框架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展开，也是“人情”到“天理”的关键媒介，^[22](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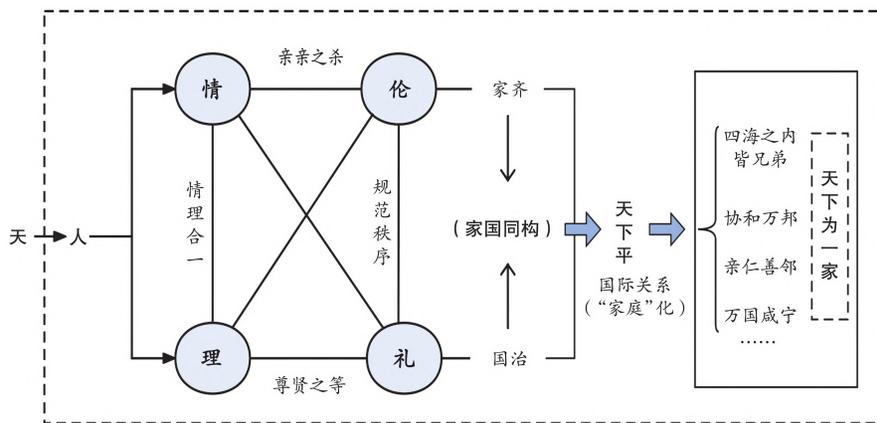


图1 “天下一国一家”的生成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总之，按照“天下国家”的传统思维模式，^⑤即将所有的社会关系和国家间关系都转化为一

① 出自《尚书·伊训》。

② 以天下为出发点，就意味着“天下一国一家”的政治秩序；以家为出发点，则意味着“家一国一天下”的伦理秩序。

③ 出自《论语·颜渊》。

④ 出自《礼记·礼运》。

⑤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天下国家”和“天下一国一家”两者表述各有侧重，前者更偏向于传统思维观念，而后者则更多地关注其结构性要素(理论模型)。

种带有家庭秩序的亲情联系,即“以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构建一个充满温情、和谐、美好的大家庭。

三、中国特色亲情外交理论的当代建构

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23]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理论构建的根本路径就在于作为中华文明传承者的中国共产党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阐旧邦以辅新命”,创造性转化“天下国家”观念,进而将其创制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理论逻辑

传统“天下国家”是基于家庭结构类推而来的,不应忽略现代国际体系与中国传统天下体系之间的核心差异,并将国际关系简化为家族关系。因此,厘清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理论逻辑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赋予“天下国家”以现代国际政治的意涵。

第一,传统“天下国家”理念赋予了现代中国以“尚情”或“重情”特质。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的过程通常被看作中国从传统“天下”转变为“民族国家”并最终走向“世界”。^[24]从传统中国到近代中国的历史转型过程之中,家国天下这一连续体系的自我断裂和瓦解深刻地促进了“国家”的崛起。^[25]然而,由于中国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国国家形态的现代化转型常常被加以忽略或否认。事实上,中国国家形态在从家国天下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历史文化的传统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国家形态内在于现代中国国家形态之中,“家国一体”的兼容结构保持了其连续性。因此,国得以持续“家化”,“国”具有了“家”的特征,这种结构性特征使得现代中国作为“国家”具有“有情的共同体”性质。^[26]

第二,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坚持天下国家理念,创造构建亲情外交形态。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外交最鲜明的特征。作为中华文明传承者的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天下国家”传统政治理想基础上,坚持与新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扬弃其等级秩序色彩,经过长时间的融入与塑造,创造性转化为“立己达人”“重情尚义”等外交形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家国天下”的传统政治秩序虽已不存在,但是家国天下的精神作为“历史文化”基因依然塑造并影响着今天中国对外关系与行为。传统“天下国家”理念获得了全新的内涵和诠释:“家一国一天下”之间的关系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不仅家与国休戚与共,更是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照。

第三,“民心政治”的传统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理论的底层逻辑。民心是人的原始本能,其外在表现即“情”。^[16]在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观念中,“心”即是“情”,“心”往往与“情”相通约。实际上,古人早已清醒地认识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①民心向背决定着政治发展乃至天下兴衰。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27]

① 出自《管子·牧民》。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共产党继承了民心政治的传统理念,将“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这一重要政治判断推广至国际政治实践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就曾指出:“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28]并把“团结世界人民”上升为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方针之一。结合前文“天下国家”的论证,我们可以进一步提炼出中国外交“重情尚义”的底层逻辑:“国家即人→天下为一家→民心即天下→行仁政得民心”。在此,“得民心”的核心路径就是要充分获得各国人民的情感认同和政治信任,这同时也解释了中国外交为什么常常将“人民”“民心”等看作道义制高点。概言之,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正是将“民心政治”的传统智慧转化到国际关系实践中,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二)理论内涵

本文认为,亲情外交^①作为一种特殊的外交形态,是指中国对外关系中主观能动地将情感融入外交话语、理念与政策中,巩固和强化国家间的亲缘关系与情感纽带,增强中国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亲情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传统天下观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具体体现。从亲情外交的理论内涵出发,可以演绎出亲情外交“天下一家亲”的世界观,“天下无外”的方法论和“化成天下”的价值观三个维度(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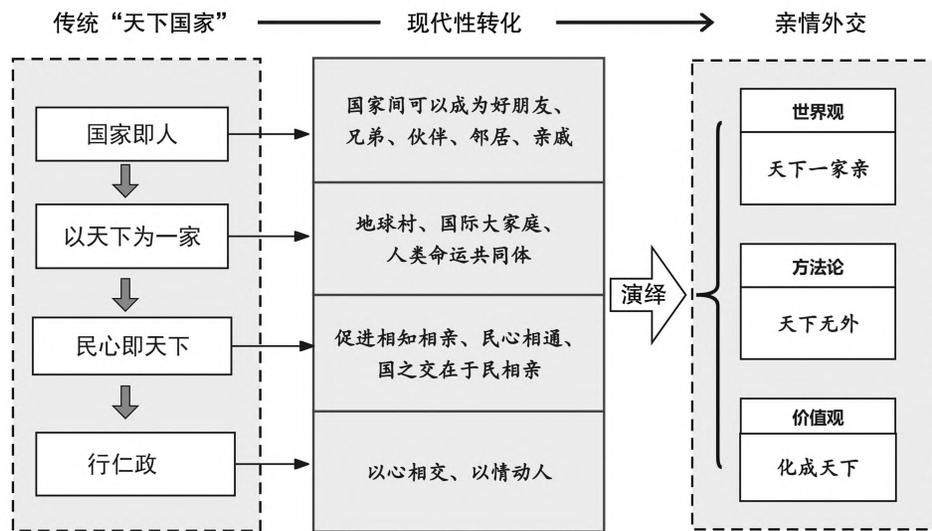


图2 中国特色亲情外交理论逻辑与理论内涵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1. “天下一家亲”的世界观

“天下一家亲”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所秉持的世界观。中国自古有“天下一家”的传统观念,中国文明史观所塑造的“天下国家”决定了我们需要以“天下”作为思考单元。^[29]正如老子曰“以天下观天下”。^②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

^①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在此“亲”强调的是增进情感纽带关系,例如“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传达了希望巩固与周边国家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的共同情感。

^② 出自《道德经·第五十四章》。

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30]人类社会被视为一个相互往来,休戚与共的大家庭,各国不仅在安全和利益方面密切相关,而且在感情方面彼此关心,相互支持。中国以“天下一家”之共同亲情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利益共同体,更是亲情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30]当今世界,各国之间是邻居、朋友、亲戚,共同存在于一个大家庭之中,各国之间日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大家庭中,中小国家占据绝大多数,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和长期趋势,大国和小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等。

这也启示中国不仅要考虑战略利益,还要考量国家间的情感。实际上,中国外交一贯坚持“天下一家亲”的外交理念,并对中小国家展现出“贯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的深厚情谊。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峰会上也讲到“我们像亲戚一样常来常往,重情义,讲信义,遇到喜事共庆贺,遇到难事互帮衬。”^[31]2023年5月的中国—中亚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兄弟情谊胜过一切财富”。^[32]在深化与非洲国家关系时,中国多次表示中国和非洲国家是“风雨同舟的好朋友、休戚与共的好伙伴、肝胆相照的好兄弟”。这些外交的言辞和行动都表明,“天下一家亲”的世界观认为各国之间可以成为友好的亲戚、兄弟和朋友,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的人类大家庭。协和万邦、讲信修睦的“天下一家亲”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的世界观,构建平等相待、同舟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其现实展开。

2. “天下无外”的方法论

“天下无外”是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的方法论。“天下无外”实际上是对“以天下为一家”理想进一步延续,是中华文化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其遵循着开放包容,以及化敌为友两大核心原则。

一是“天下无外”的方法论体现在中国开放包容的外交原则,强调国家间并非对立冲突的、绝对的自我和他者,只有相对的“我人”。^[33]“德不孤,必有邻”,胸怀天下者必然朋友遍天下。基于这样的认知,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并不采取排他性的对立思维,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交朋友”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以大小强弱论亲疏的外交原则。对中国而言,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没有所谓“阵营”,只有真诚伙伴。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场合常引用“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因为情真心近,情投意合,所以友谊可以跨过山海。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截至2023年7月,中国已同18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11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34]

这一包容性同时也深刻体现在中国对外政策中,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一带一路”被西方一些国家渲染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新殖民主义”等。然而,这种逻辑仅仅是基于西方主义的逻辑推导,却忽视了中国提出倡议背后的“希望世界各族人民都过得好”的天下情怀。实际上,中国从不强迫任何国家加入,在政治上也不设置任何附加条件。《“一带一

路”倡议的全球认知趋势》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对共建“一带一路”整体上持正面评价,特别是从中亚到非洲等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感情非常深厚。

二是“天下无外”的方法论蕴含着能够“化敌为友”的外交文化。基辛格在《论中国》中也提到,“中国能使潜在的外国敌手与它结成比较容易驾驭的关系”。^[35]可见,“化敌为友”可以理解为中国对外交往中强调以改善关系的方式解决冲突,由“化敌为友”到“仁者无敌”,最终塑造一个“没有敌人,都是友人”的理想世界。例如,在中国的努力斡旋下,2023年3月伊朗和沙特长久以来的敌对关系得以化解,并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进而在中东地区掀起“和解潮”。这一过程中,中国与中东国家同时保持友好关系和“化敌为友”外交理念可以说功不可没,这更加凸显了中国外交的高“情商”。

3. “化成天下”的价值观

“化成天下”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所遵循的价值观。《周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①“化成天下”的价值论具有鲜明的亲情伦理倾向,强调“任德不任力”,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感化方式来实现化家、化国、化天下的政治理想。^[36]所谓“化成天下”,主要是一种文化、亲情与观念上的认同。

第一,实现“化成天下”的过程根植于情感特质。首先,情感具有流动性,它可以在宏观的国际体系和微观的个体观念之间建立联系,将它们连接到一个完整的、流动的体系中。其次,情感具有灵活性,与国际关系中物质要素变化的滞后性相比,其能够在对外关系中更迅速地被识别并作出相应的反应。再次,情感具有柔和性,正所谓“柔弱胜刚强”,运用其亲和力、包容力等柔实力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德服人”的外交效果。天下根植于人类的伦理情感,由于“天下”囊括一切,“天下”之外别无他物,从而可以借助这种伦理特性一步一步推广延伸至天下层面,实现“化成天下”的政治理想。

第二,中华民族“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理念是“化成天下”价值观的现实反映。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古代中国对外交往和对天下秩序的构建是极其亲善温情、开放包容的,古代中国对外关系上一般也都采用文化同化的政策来对待周边民族和国家。正如《礼记》中所述:“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在天下观念指引下,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深受“仁爱”“尚和”观念影响,所谓“任德不任力”,即以自身文化和道德感召力影响周边国家,而非“以力服天下”。因此,亲情外交不仅被视为人际关系的调节方式,也是建立和谐友善的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手段,而“化成天下”则被认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第三,“化成天下”的价值观为中国外交塑造了宽广的世界情怀和强烈的道义担当。中国共产党把坚持“胸怀天下”作为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党的二十大又进一步将其提升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把自己的外交视野放在全球高度,中国在国际场合提出了正确义利观、新型国际关系以及三大全球倡议等一系列重要外交理念。2023年年底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则进一步强调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3]这些都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化成天下”的外交价值

① 出自《周易·贲卦》。

观,从而反映了中国外交追求“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美好理想。

“天下一家亲”的世界观、“天下无外”的方法论和“化成天下”的价值观分别回答了“世界是什么”“中国应当如何做”“世界应该是怎样的”的基本理论问题。世界观是方法论的基础和前提,价值观是世界观的展开,世界观与方法论统一于价值观。三者和内容上的相互联系、相互包含,在逻辑关系上一脉相承、层层递进,并逐渐在亲情外交的理论内涵中得以具现。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不仅契合现代国际交往的需要,还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天下情怀,充分展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三)理论范式:“情→伦→礼→理”分析框架

中国外交哲学和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刻反映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性、关系性和共生性等辩证思维方式的中华文化基因,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37]

首先,正如《咸·彖》云:“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周易·系辞传》亦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受到中国传统感通哲学和辩证思维的影响,中国特色亲情外交理论分析重点就在于对情感形态的动态分析。基于上述逻辑,“情”与“理”之间的相互渗透、交融、贯通、统一,进而形成一种复杂多元的双向互动关系。

其次,根据关系性逻辑和家国同构思维,当代中国对外关系中同样存在着类比家庭秩序的亲情结构要素,从前文论述的理论模型可以复制出“情”“伦”“礼”“理”概念。这四个要素之间的互动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互动机制,此外这四个要素之间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促进、相互联系的,这四个基础环节按照一定的顺序依次连接,构成了一个动态循环的亲情外交框架。

最后,中国人往往将国际关系视为人际关系的延伸和放大,所以笔者尝试从跨学科的角度,借鉴本土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理解和诠释上述动态过程,认为这一过程实际上反映的是“通情”的运作机理。^[38]根据上述分析和论证,本文尝试超越二元对立的观点,从一个系统和动态的视角来探讨亲情外交,并作如下理论假设(见图3):

(1)“情”:因为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外交通常会以一种普遍而积极的“共通情感”(共情)作为亲情外交的出发点,并通过“将心比心”的方式来实现国家间的情感共鸣和同理心。

(2)“伦”:基于关系性思维,中国在内外融通、彼此互动的角色亲情关系网络中,遵循角色扮演原则,感知并确定国家间关系属性,根据不同的外交关系进行情感投入,从而促使国家间亲情在关系网络中得到持续转化和扩展。

(3)“礼”:中国外交遵循“情理相称”的实践要求:一方面注重“推己及人”,使得国家主体间的感同身受成为可能,进一步促进亲情共同体的形成和扩大;另一方面“以礼制情”,重视调节和制约情感表达,以达到“时中”的最佳状态。

(4)“理”:中国在国际政治实践中,通过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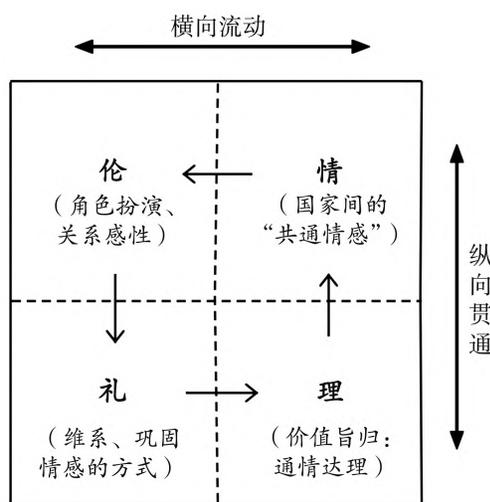


图3 中国特色亲情外交的理论范式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化、逻辑化、通则化的方式把感性情感提升为理性化的亲情,从而确立中国外交合情合理的行为模式与价值取向。

总体而言,该理论范式强调“情”在对外关系中的原发性与先在性,并将亲情外交抽象和简约为其在内外相通的各个环节中往返互动的动态过程(“情→伦→礼→理”)。由此可见,亲情外交理论范式内含四重逻辑:一是“情”与“伦”的良性互动;二是“伦”与“礼”的相互协调;三是“礼”与“理”的和谐统一;四是“理”与“情”的交融渗透。^①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的实践

中国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一直是一个情感丰富的国家。根据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设,下文将结合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进行学理分析,作初步验证。

(一)起点:“情”以国家间的“共情”为基础

“这个世界上最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39]习近平主席的重要宣示,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理念,更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真情流露的“恻隐之心”。这与孟子由“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得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②逻辑相一致。

1. “共情”的逻辑前提

首先,“情”这个汉字自始至终都包含了两个核心意义:“情感”和“真实的情况”。在“情”字的结构中,“青”代表声符,“心”代表意符,这意味着“情”实际上是“心”的一种表现。因此,“情”的原始含义应为:内心最初的情感状态,起初就强调情感的积极意义和真情实感。

其次,“情”是达至彼此“心通”的枢纽。心能相通是因为情能相通,因此中国人重感情,讲人情,其前提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是相通的,所以“情”成为中国人际关系的核心。^[40]这一思维至今仍在起作用,并且在集体无意识层面影响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从孔子起,“忠恕”“不忍之心”“将心比心”“心心相印”等情感上的相通方法,就成为中国人的处事原则。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生乐在相知心。”如何知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通过深入对话和实际行动获得心与心的共鸣。^[41]

最后,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际交往经常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多重复杂因素的阻碍,同时也受到怀疑、偏见、恐惧乃至仇恨等心理因素的影响。但是,共同的、积极性情感能够帮助各国间在情感层面上的互相认同,通过赋予特殊的情感意义,深化为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增进国家间的情感认同。因此,建立和培育国家间共同的、积极的亲情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的逻辑前提和起点。

2. “共情”的具体表现

元首外交是新时代中国对外交往的最高形态,对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截至2024年7月,十多年来习近平主席49次出访,足迹遍及五大洲70余个国家,出席

^① 需要强调的是,该理论范式忽略了其他并非不重要的因素,呈现出一种理想化的状态。

^② 出自《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126场国际会议。^[42]可以说,习近平主席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的引领者、践行者与推动者,习近平外交思想很大程度上赋予和塑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的气度与温度。

一是中国外交常常是先动之以情来达到心与心的共鸣,将“情”与“理”结合起来。以情为先是进入对方内心世界、产生亲和力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主席在外交场合先是“以情感人”,以充满情感的话语将听众与自己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运用“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朋友多了路好走”“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等通俗易懂的白话来表达情感上的亲近、认同与友好。在此基础上,正所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情不通则理不达。”中国外交再“以理服人”,比如谈及两国政府合作、共同利益、彼此看法,并借此阐述好“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三大全球倡议等等,将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以“情理交融”的方式深入人心,凝聚共识。

二是国家间的“共情”往往是由共有的意识、共同的历史、相似的经历来建构。在国家交往方面,习近平主席往往回溯两国的共同奋斗历程来唤起共鸣。例如,在老挝和越南两国,习近平主席分别讲述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奋斗历史。在秘鲁国会,习近平主席称秘鲁是中国在太平洋对岸的“邻居”,两国有着400多年的友好交往史。在公共外交方面,习近平则讲述中外民众友好交往的事例。例如,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习近平主席讲述中哈友谊的“熊猫血”故事和中国小伙跨越半个世纪寻母的感人故事。此外,习近平主席还经常讲述自己的经历来引发情感共鸣。在华盛顿欢迎宴会上,他讲述自己目睹的梁家河发展变化,有效地消除了与美国听众之间的疏离感,增进他们对中国的认识。

(二) 中介：“伦”是关联和延伸情感的关键

“伦”是关联和延伸国家间情感的中介环节。“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伦是一个人所有角色关系网的总和,国家同样也是一个关系体。由此可见,国家的角色定位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情感“温度”,不同的角色必然会带来不同的情感基调,“伦”主要分为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来关联和延伸情感,情感在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中流动。

1. 纵向维度

从纵向看,国家角色的变化必然反映在对外关系的情感投入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就决定了中国外交在保持延续性的基础上开始明显“升温”,突出强调对外工作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从21世纪以来的党代会报告可见一斑。^[43]

首先,党的十六大与十七大报告均没有提及“大国”定位,更强调“发展中大国”定位,^①这与当时“韬光养晦”的外交基调是相符的。随着中国“大国”意识不断凸显,党的十八大提到“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6次提到“大国”。这一角色定位在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得到了延续,并被提及了5次。这预示着“奋发有为”的中国外交背后的情感基调的大变化,更显振奋、积极。

^① “发展中大国”更强调发展中国家,因此不统计在“大国”角色中。

其次,通过观察具有情感色彩的“积极”和“反对”用词的数量变化,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外交整体性情感的演变。与21世纪初相比,党的十八大后这一数字有了明显的增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引用了11次“反对”和10次“积极”,这背后展示的是中国的“大国自信”和“大国担当”。

最后,这种情感“升温”会自然而然延伸到中国对外政策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就是很好的例证。随着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持有各种复杂的情感,包括期望、疑虑和质疑。对此,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大量的、积极的情感投入。可以发现,党的十八大报告7次提到支持、巩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又重申中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不变。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国人民是重情义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曾经风雨同舟、相互理解和支持的老朋友”,^[44]这些外交话语与政策展现了中国不辜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期望的一种情感宣示。

总之,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的转变,就如“奋发”意味着精神振奋和情绪高涨。可以说,这种角色定位的转变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奠定了更为积极和浓郁的情感底色。

2. 横向维度

从横向看,情感在关系世界中传递和流动,从而实现关系的优化。然而,“关系性”概念中暗含差序等级,特别在利益与权力相互交织的国际社会中,如果仅仅依据理性逻辑可能会导致关系缺乏弹性和包容性,进而导致关系停滞与僵化。因此,正是在关系性实践上,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为解决、优化国家间关系问题贡献出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国际社会不仅是一个理性的社会,而且是一个感性的社会,“关系”可以被划分为理性关系和感性关系。^[45]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的关系性思维更侧重于“关系感性”的实践。更确切地说,实际上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正是将“关系感性”思维运用在国际关系实践中,通过构建、维系以及优化关系,以达到“合情合理”的效果。因此,中国外交的情感策略是通过关系的细化和分化来实现的。中国看待关系亲疏远近的心态是“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以积极的情感促进成员之间和谐相处。^[46]这就意味着中国外交会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来制定个性化的外交政策,并通过“量身定制”的情感投入来建立、培养和优化这些关系。

这在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中有所体现,例如“真实亲诚”对非理念与“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虽仅有两个字的区别,但是侧重点却大有不同。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对待非洲朋友,我们讲一个“真”字。开展对非合作,我们讲一个“实”字。前者着重强调了中非关系的真诚和坚定,展现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起的同舟共济、历久弥坚的兄弟情谊,并推动中非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而后者则更注重互惠与包容,表明了中国愿意以更多包容与尊重的实际行动与周边国家合作共赢。可以看出,这两种理念的微妙差别可以在外交实践中产生重大影响,决定了国际合作与交往的方式与深度。因此,亲情外交在强调理解和把握不同对象情感投入上微妙差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实际效果比“一视同仁”的外交政策更为明智。

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并非着重于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是清晰地认识到,在对外关系中通过差异化的方式能更有效地进行情感投入,最终实现国家间关系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理想状态。

(三) 路径：“礼”是维系和巩固情感的形式

“礼”是培育和维系国家间情感的形式、规范和具体实践。礼是情的形式，情是礼的内容。《礼记》曰：“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礼尚往来所崇尚的是彼此有礼，使“礼”成为国与国、人与人之间情感紧密联系的强大纽带。

1. 礼宾外交

仪式感的外交礼宾是增强国家间情感的“变压器”。党的十八大以来，外交礼宾工作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在礼宾工作中注入了更多的情感因素，集中体现中国活跃的首脑外交和主场多边外交中。外交欢迎仪式的改革，进一步展现了中华民族崇礼尚义、热情友好、宾至如归的待客之道。例如，2013年6月，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应邀访问中国，中国在欢迎仪式上加入了吹奏迎宾号角的表演，同时重新组建了少年儿童欢迎队伍。2014年10月，坦桑尼亚总统访问时，中国外交礼仪重新恢复了国宾摩托车护卫的传统。2015年11月，法国总统奥朗德访问中国，中国重新恢复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室内欢迎仪式时鸣放礼炮的外交传统。

国家间情感在外交仪式中得到了加强或转变，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情感在外交仪式的互动中可以转化为共同的、集体的积极情感，并有可能最终助力国家间的长期关系发展，进一步维系和巩固国家间的友好情谊。

2. 国礼外交

国礼是国家间情谊的结晶，能表达和传递情感，促进感情良性发展。中华礼仪之邦的国际交往讲究礼尚往来。国礼作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媒介，是一种能传情达意的语言和符号，有助于阐释亲情外交的价值理念。

中国传统社会也讲究“情礼相称”，这个道理放在国与国之间也是适当的。新时代中国亲情外交以国礼为媒介，将情意融入其中，通过表达释放诚意信号，^[9]向对方传递建立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友情和增强国家间的互信合作的信号，这些情感细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间的情感交流。在新时代国礼外交实践中，习近平主席善于将中国外交理念融入国礼，以表达加强合作的期望和维护友谊的愿望，进而充分展现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情感感召力。

2013年6月，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时，赠送习近平一套茶具和一个朱漆盒，其中漆盒寓意着“两国好合，如胶似漆”。中国则回赠了一幅书法作品和一件陶艺作品，书法作品选自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象征着中韩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2014年回访韩国时，习近平在首尔大学的演讲中引用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更蕴含了中国期望深化中韩关系的“心意”。习近平在2017年访问越南时赠送的19期《人民日报》中，涵盖了1955年胡志明访华的报道，充分展现了中越两党之间密切的友好关系，可谓情深意重。2022年9月，习近平在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出访，考虑到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是一位“博学的汉学家”，所以带去的几件国礼中就包含了一套文房用品。新时代中国国礼外交生动反映了中国对外交往中源远流长、相知相亲的深厚情谊。

3. 非传统形式外交

中国外交灵活运用非传统方式培育国家间的情感纽带，不受传统外交形式约束，能够巧妙地维系和巩固国家间的友谊。

2013年APEC会议期间,我国的外交官巧妙地将生日蛋糕作为一种礼宾形式庆祝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生日,为庄严盛大的外交工作增添了人情温暖。作为回赠,2016年G20杭州峰会开始前,普京从莫斯科为习近平主席带来了冰激凌。2014年俄罗斯举办索契冬奥会,习近平在与普京会见时表示,中俄是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按照中国习俗,邻居办喜事,我当然要专程来当面向你贺喜,同俄罗斯人民分享喜庆。“家乡外交”从亲情文化方面推动了外交实践。2014年9月和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与莫迪分别访问彼此故乡,体现了中印两国共话友好情谊、续写合作篇章的深厚情感。此外,“体育外交”“点对点外交”“云外交”等非传统外交,不仅形式上灵活务实,而且内容上具有丰富情感。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举办的一系列重大主场外交活动,一些带有中国特色的“新亮点”展现了中国外交常见面、重感情、暖人心的重要实践。2021年3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次访问的地点选择了广西桂林。2021年3月31日,新加坡外长维文、马来西亚外长希沙慕丁、印尼外长蕾特诺和菲律宾外长洛钦应王毅外长邀请对中国进行访问,会晤的地点在福建南平。在那次会晤中,希沙慕丁表达了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深厚的友情,用中文表达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他还用中文友好地称呼王毅为“大哥”,而王毅则回应说“我们是兄弟”。

这样的主场外交不仅增强了国与国之间的亲近感,还让国际关系更为亲近和充满情谊,有效地推动了国家间感情的相互传递和交往。相较于传统的正式外交场合,这种亲切的氛围可以让会谈各方更加放松,更愿意分享彼此的想法和情感。

(四)目标:“理”是建立并培育情感的旨归

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是以情感为基础、又以理性为指导的,以实现通情达理、合情合理。《说文解字》指出,“理,治玉也”。汉语中的“理”字最初就具有人为践履活动方面的语义,即理性主要是一种实践理性、价值理性,是“情感化的理性”。^[47]

可以发现,“情→伦→礼→理”的动态过程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的“情理”逻辑,如果借助心理学的相关成果将这一逻辑延伸和展开,可以发现这一过程采用比拟、类推的方法,体现了理性的指导作用(见图4)。2015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巴基斯坦议会的演讲中讲道:中巴要弘义融利,实现共同发展。中华文化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8]正如习近平多次讲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过程表现为理性对情感的调节和约束作用,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体现了理性对情感进一步的推广和升华。“情”与“理”相互渗透、互相促进,从而形成中国外交的“情理”逻辑。

这一“情理”逻辑体现并外化为具体的外交规范和制度,并确立了中国对外关系合情合理的外交模式。例如,2023年6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也正是这种逻辑的延伸,其指导思想中明确“发展对外关系,促进友好交往”,整部法律中出现“国际合作”“交流合作”“友好交往”“交流与合作”共20处,^[49]通过将对外关系进行统一立法,以立法的形式将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积极“情感”上升到普遍“理性”,更好地引领、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实践,这进一步证明了“理”是“情”的价值旨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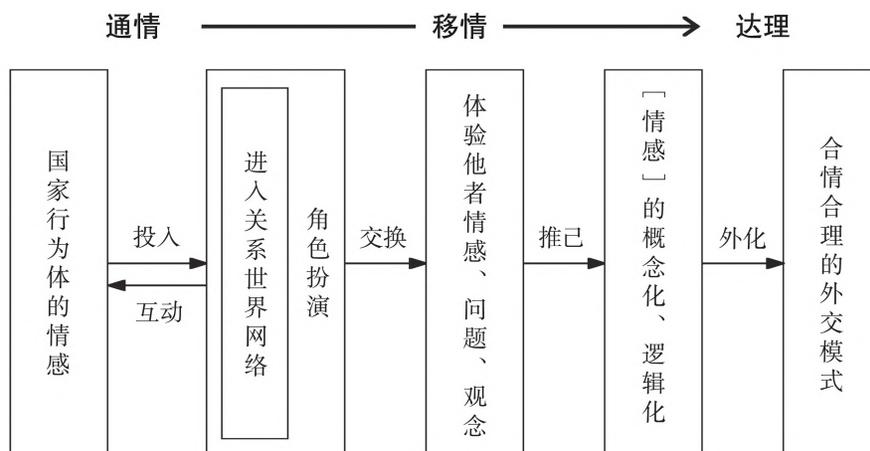


图4 中国外交的“情理”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总之，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情理并举、情理融通，通过“情”达到对“理”的把握，使国家间关系更良性、更和平、更温情，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

五、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指出，“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立足于共同的价值观念来帮助朋友、深化感情和扩大合作，从而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情感认同和政治信任。亲情外交不仅有助于促进国家间关系变得更和谐、包容与温情，推动构建和衷共济、美美与共的命运共同体，^[50]更有利于我国提升外交话语权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感召力，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不仅具有中国内容和民族形式的特殊叙事，其实质上还蕴含着人类文明的一般性政治原理。亲情外交继承、丰富并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和合”“共生”等核心理念，超越了国强必霸、零和博弈的国际关系旧思维，为推动构建“天下一家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路径。

未来世界将继续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旧国际秩序的博弈将进一步强化，新时代中国特色亲情外交理论深深根植于中华文明“天下一家”理念，并在促进世界大变局演进和新型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为破解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

参考文献

- [1] 王毅. 为中美关系把舵, 为亚太合作领航力[EB/OL]. http://switzerlandemb.fmprc.gov.cn/web/wjzbhd/202311/t20231118_11182995.shtml, 2024-01-17.
- [2] 习近平. 赓续传统友谊, 开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征程[N]. 人民日报, 2023-12-14.
- [3]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 人民日报, 2023-12-29.

- [4] Jonathan Mercer. Emotional Beliefs[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4 ,No.1 ,2010 ,pp.1-31.
- [5] BrentE. Sisley. Theorizing States' Emotions[J].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1 ,13(3) :452-476.
- [6] Todd H. Hall. Emotional Diplomacy : Official Emo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M].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39-40.
- [7] 张清敏.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9) :64-87.
- [8] 尹继武.诚意信号表达与中国外交的战略匹配[J].外交评论,2015(3) :1-25.
- [9] 刘博文.中国对周边中小国家的情感投入——双向逻辑与双重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2) :97-126.
- [10] 杨光斌.政治学方法论与历史观问题[J].政治学研究,2023(5) :154-168.
- [11] 徐嘉.儒家伦理的“情理”逻辑[J].哲学动态,2021(7) :104-114.
- [12]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00.
- [13] 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J].中国社会科学,1998(5) :96.
- [14] 李泽厚.哲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3,387.
- [15] 李泽厚.论语今读[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19.
- [16] 王向民.传统中国的情治与情感合法性[J].学海,2019(4) :55-63.
- [17]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N].人民日报,2023-06-04.
- [18] 汪仕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历史政治学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1) :28-38.
- [19] 王日华.先秦时期自然状态思想与理论建构[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7) :98.
- [20]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8.
- [21] 刘九勇.儒家家国观的三个层次[J].哲学研究,2021(6) :64-74.
- [22] 陈云龙.从情到仁:孔子的“过程人情观”[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 :45-59.
- [23] 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N].人民日报,2019-01-04.
- [24] 赵思洋.因应国际社会——论近代中国天下思想的创造性转化[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5) :7.
- [25] 许纪霖.现代中国的家国天下与自我认同[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 :46-53.
- [26] 姚中秋.以中国定义国家:“国一家”作为有情意的政治共同体[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 :74-85.
- [27]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
- [28]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88.
- [29] 杨光斌.世界政治演变的动力与逻辑——关于世界政治学原理体系的思考[J].教学与研究,2023(9) :61-75.
- [30]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N].人民日报,2017-12-02.
- [31] 习近平.命运与共 共建家园[N].人民日报,2021-11-23.
- [32] 习近平.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23-05-20.
- [33] 任晓.论中国的世界主义——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二[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8) :30-45.
- [34]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问答[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 :163.
- [35]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M].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16.

- [36] 吴根友,姜含琪.再论“人文易与民族魂”——萧蓬父的“易哲学”思想探论[J].周易研究,2015(5):13-22.
- [37] 邢丽菊.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J].东北亚论坛,2018(6):8.
- [38] 景怀斌.“忠恕”与“通情”——两种人际认知方式的过程与特征[J].孔子研究,2005(5):38-46.
- [39]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11-30.
- [40] 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44-255.
- [41] 习近平.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N].人民日报,2013-03-26.
- [42]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外交足迹[EB/OL].http://cn.chinadiplomacy.org.cn/node_8013835.shtml, 2024-03-01.
- [43] 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EB/OL].<https://www.12371.cn/special/lcddh/>, 2022-10-25.
- [44] 习近平.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曾经风雨同舟、相互理解和支持的老朋友[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8/25/c_1112221964.htm, 2023-12-13.
- [45] 刘胜湘.中国学派还是美国范式——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研究[J].社会科学,2020(11):3-15.
- [46] 詹德斌.试析中国对外关系的差序格局——基于中国“好关系”外交话语的分析[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7(2):35.
- [47] 蒙培元.中国哲学中的情感理性[J].哲学动态,2008(3):19-24.
- [48] 习近平.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N].人民日报,2015-04-22.
- [49]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EB/OL].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6/content_6888929.htm, 2023-12-01.
- [50] 吴志成,刘培东.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新型国际关系观[J].东北亚论坛,2022(2):11.

[责任编辑 路京京]

ABSTRACTS

The Manifestation of Rationality Depends on the Interaction of Emotions—Theory and Practice of Emotional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ZHAN De-bin CHEN Jun-jie · 3 ·

Abstract: The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demonstrates a distinctive style of "a blend of emotion and reason, with sincerity and warmth," which has greatly enhanced China'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ppeal, and shaping power. However, to date, Chinese academics have not yet conducted any systematic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emotional diplomacy. In light of this, this paper seeks to construct a theory of emotional diplomacy by drawing on the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research path of "historical political science." Firstly,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ctively draws on tradition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which contains the triple theoretical logic of modernizing the "the state of Tianxia (all under heaven),"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politics of people's hearts. Secondl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of emotional diplomacy, three dimensions can be deduced: the worldview of "the world as one big family," the methodology of "a world of no exteriority and only interiority," and the values of "edifying the populace so that the rule by civil means can prosper." Finally, this paper abstracts and refines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emotional diplomacy and conducts a preliminary verific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Practice shows that emotional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which balances and integrates emotion and reason in handl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n help to further strengthen China's voice in diplomacy and present a credible, amiable, and respectable image of China.

Key Words: Emotional Diplomacy;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Historical Political Science

Differences in Security Order Concep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sian Security Order

WANG Jun-sheng · 20 ·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sian security order is conducive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order concept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sian security order. In terms of the Asian security order concept, China has proposed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has put forward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differences in the order concep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lie in the former's advocacy for unilateral security, pursuit of hegemonic politics and the promotion of bloc confrontation, and the latter's advocacy for cooperative security, pursuit of Asian coordination, and building of Asi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Most Asian countries support China's order concept and have doubts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concept, with only a small number of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South Korea, the Philippines, and India supporting the United States' concep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sian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related countries in promoting regional security order, China should uphold the principle of indivisible security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sian security order and re-assure "peace" by strengthening the top-level design; comprehensively utilize "economic" and "security" means to continue to promote security through economy and increase the input of security resources; and intensively and meticulous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by region and country and balance the influence of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Key Words: Concept of Asian Security Order; Asian Security Order; Sino-U.S. Relations; Asian Countries;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motional Logic of National Security: A Theoretical Analysis

YIN Ji-wu JIA Yu-xian · 34 ·

Abstract: Existing research on national security mostly views the status and process of national security as results of rational national construction, neglecting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emotional factors. Emotional factors can influence national security beliefs,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security commun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status. In other words, national emotions and leaders' emotions are able to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beliefs. The emotions of the public and leaders can both shape the process of making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s and strategically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policies. Emotional attachment and emotional trust between nations are capable of helping build and maintain a security community. Leaders' ability to control and utilize emotions can facilitate the achievement of a national security status, as primordial emotions like anger and hatred can trigger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while instrumental emotions can promote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s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Clarifying the emotional logic of national security is beneficial for improv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theoretical system and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as well as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s, and also helps to provide a feasibly microscopic path for realizing China's security proposition.

Key Words: National Security; Emotional Logic;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Security Community;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Rearrangement Strategy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easures,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raints

ZHUO Ye SONG Yi-ming · 49 ·

Abstract: Tackling global issues functionally and serving foreign policy with non-neutralit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re used to implement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statecraft and maintain American hegemony b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electively returning, reinforcing leading and control, creatively building, integrating and reinforcing are the main means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statecraft, which aims at persisting in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competing in geopolitics. Overall,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statecraft features exclusiveness, domestic orientation and covering numerous issues, indicating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regard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s its positive strategic assets. However, due to the defect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a decline of the U.S., opposition from international bureaucrats and constraints of domestic politics and econom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statecraft is difficult to implement.

Key Words: Biden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Statecraft; Sino-U.S. Relations; the United States